

前 言

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。在这次革命中，涌现出大量革命风云人物。他们通过长期无私无畏、英勇艰苦的斗争，终于“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”取得我国民主革命的巨大胜利。

在辛亥革命中，先父李燮和也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。然而，长久以来，他却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。如所周知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完全被纳入国民党史的范畴。他们认为：尽管国民党的党名几经改换，但实际上国民党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正统。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斗争中起着主导作用，在辛亥革命中，同盟会就是惟一的领导团体；因此辛亥革命史就应当着重研究同盟会的革命历史，研究它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。按照这个说法，当时的华兴会、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不仅要被排除在辛亥革命之外，而且也因其非正统而受到不公平的轻蔑和诋毁。先父早年参加过华兴会、光复会和同盟会，而且是这几个组织的主要成员。但由于先父与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章太炎、陶成章情谊深厚，意气相投，政见一致，特别是光复会与同盟会合而复分以后，先父一

直是参加光复会的革命活动与领导工作，因此也被视为不属正统，打入另册。几十年间，先父东奔西走 南征北战 为辛亥革命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但在一些辛亥革命史著作中，对此不闻不问，不置一词，若无其事 偶有涉及 亦面目全非 极不公允。如上海起义 1911年 前夕 同盟、光复两会共同协商 因沪淞两地军警人员大都是湖南人，而先父是湖南人，便于策反，因此共同推定先父主持起义工作。又因先父在南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鼓吹革命，颇得华侨之敬仰和爱戴，威信卓著，便于号召，因此，又约定在起义成功后，由先父出任沪军都督。但在协商过程中，先父原本不同意在上海设立沪军都督府，而主张把主要精力用于招募大批军队，准备北伐。但同年 11 月 3 日下午陈其美却企图抢头功，不与先父联系，就贸然率领敢死队会同商团，进攻制造局 结果民兵不敌 陈其美及民兵数名被俘 商团退走。先父闻讯大惊，立即率领敢死队及诸营去高昌庙救援，一举占领制造局 救出陈其美 诸军推先父为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。上海全境光复后，陈其美趁先父稍事休整时间，又私自召开会议，自封为上海都督。诸营官兵闻而不平，群情汹汹。先父则鉴于武昌起义不久，上海刚刚光复，全国形势尚未稳定 如果兄弟阅墙 不但令人耻笑 更将贻误大局，故力主忍让，他非常耐心地说服了全体军警官

兵 并力劝陈其美拨出部分军饷 安定军心 ,一场轩然大波 ,才得以平息 ,从而维护了上海光复的成果。而在一些辛亥革命史上的著作中 ,往往都讳言这段历史。反而颠倒是非 ,竟说先父争当上海都督。而对陈其美却是百般美化歌颂 ,对先父则尽力歪曲贬抑。又如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 ,先父坚决抵制 ,袁便派人将先父长期软禁家中 ,使他失去自由。以后袁筹组‘ 筹安会’ 鼓吹复辟帝制 却又私自将先父列为发起人之一 ,公诸报端 ,制造假象。这本来是袁欺世盗名的一贯伎俩。先父事前毫不知情 ,事后又无法辩白 ,因此完全是无辜地被袁世凯绑上了贼船。但在一些辛亥革命史著作中 ,却把矛头对准先父 无端恶毒攻击 甚至捏造事实 肆意诽谤 加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。试问 :在这种辛亥革命史的影响下 是非颠倒 以讹传讹 人们怎么能对先父的一生会有正确的了解与认识 ,史学界又怎么能对先父的历史重视和作出公正的评价呢 ?

2001年是辛亥革命的九十周年 ,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民主革命 ,也为了缅怀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先烈和亲人 ,我们撰写了《先父李燮和的一生》一文。文中我们实事求是的回顾了先父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的一生 ,并论及辛亥革命时期各革命团体内部的关系 华东地区的革命格局 上海 南京光复的经过和民国时期的南北议和谈判以及“ 筹安会 ”等各

方面的问题，作了比较全面的完整的追述。现在我们又将此文作了补充，改题为《追忆先父李燮和》，以示区别。敬请审阅，并请不吝批评指正。

我们以为，事实终归事实。近些年来，许多亲身经历之前辈及史学家们陆续撰文或著书，以其以历及翔实的史料，阐述了这段历史，为以事实说话，本书在附录中选登了部分文章，它们是杨镇毅遗稿《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》、杨镇毅述、杨福祥记《光复会和光复军》、沈渭滨撰《辛亥上海光复的李燮和与陈其美》、张学继撰《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的是与非》供读者参考和研究。

为出版本书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廖铁先生多方搜集图片资料、设计封面使其顺利付梓在此一并致谢。

李兴潇 李兴藻

来示请寄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长春巷 9 号李兴藻收
邮 编：410008 电 话 0731 - 4314750

追忆先父李燮和

李兴潇 李兴藻

(一)

先父李燮和，字柱中，号代均，1873年11月16日（清同治十二年九月廿七日）出生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光明山（今属湖南省涟源市）一个茶商家庭。

早年，他和先叔李云龙在家乡从师读书，接受传统教育。他自幼聪慧，为人正直，好学深思。老师为他讲解《论语》“夷狄之有君”一节时，引用当今皇帝作比喻，他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夷狄人来统治我中国？”弱冠后，读王船山遗书，更慨然有亡国之痛。有为言革命者，虽心醉其说，究竟未知要领，读书依然如故。因为受过儒学的熏陶，他思想上仍然向往走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道路。

1898年夏，先父与先叔同赴省垣应童子试。此时，维新运动正在全国兴起，湖南得风气之先，更是盛极一时。先父在长沙所见所闻，心情振奋，耳目为之一新。然而，就在两人考取秀才不久，清廷发动戊戌政变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，谭嗣同等六人惨遭杀害，使他极为痛心。这年冬天，他决定独留长沙，投入刘凤苞太史门下以求深造。刘太史名声很大，但墨守陈规，敌视新学，先父在其后一年多的学习中，学问上进展很少，思想上格格不入，不免大失所望。1900年春，他写信要先叔重来长沙，共同求学于求实书院。

当时，求实书院是湖南的一所高等学府，戊戌政变后由原时务学堂改办而成。在清廷的干预下，学校的人事和课程等方面有所更易，但求新求实的宗旨与学风基本未变。先父在校学习三年，研习经史，兼学社会、自然科学及日语。不仅知识领域大为扩展，民族意识与民主思想更加深入脑海。特别他在校学习三年期间里，国内连续发生了三件大事：一是义和团运动的被镇压；二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失败；三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和《辛丑和约》的签订。这一系列事件的发

生，使他更深深地认识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满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。从而促使他更坚定地要投身到反清爱国的革命斗争去。

在长沙期间，先父又结识了黄兴、蔡锷、刘揆一、禹之谟、谭人凤等革命党人，经常和他们交往。

1903年，先父与先叔在求实书院修业期满。先叔考取官费东渡留学日本，进陆军士官学校。先父应聘去宝庆中学堂担任教习。在平日教学中，他既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，更注意向学生灌输反清民主革命思想。在这期间，他与当地会党和革命人士保持联系，进行革命活动。1904年夏，他在宝庆创立黄汉会。“黄者黄帝，汉者汉人；欲以此苏国魂而振汉声，祖黄帝而耀先烈”。寓意反清革命。黄汉会初立时，仅有先父、先叔（成立时，他虽未出席，但他原先早已决定愿意参加这个反清革命组织）和陈天华、姚宏业、陈方度等6人；由于得到各地会党的支持，组织发展迅速，成员遍及三湘，赣西以及长江中下游各地。同年8月，先父应黄兴之邀，参加华兴会，并共同策划甲辰长沙起义工作。他原计划届时与谭人凤、李洞天、唐镜三等人一起在宝庆发

难，作为响应，旋因长沙起义过早失败而不果。

1905年2月，湘中形势有些变化，先父应党人刘纲领之约，与唐镜三等人进入隆回，再次发难，不料事机失密，为清军所乘，义军死者百余人，刘氏夫妇俱战死。先父幸免于难。但在湘中已难立足，遂应聘去酃县中学堂任教习，借教书为掩护，与当地会党联系，发展黄汉会组织。但酃县僻处湘东一隅，交通通信极不方便；时日稍久，先父与外界几乎完全失去联系。1906年上半年湘中风波暂告平息。先父应党人要求重返长沙；在驻省安化中学堂担任教习，并主持黄汉会各项工作。6月，他正准备率领黄汉会党人在长沙发动一次武装起义，不意被湖南巡抚庞鸿书侦悉，密令张鹤龄捉捕。时张为游学预备科监督，新化罗仪陆副之。张思想开明，罗与先父有旧谊，二人有意维护，先父得以先期赴避上海。他在沪遇见浙人陶成章，相与谈天下国事，十分投契，并经陶介绍参加光复会。由于此时清廷侦骑四出，上海不能久留，为安全计，先父便东渡日本，暂入东京警官学校学习。其后，他在东京曾多次与孙中山、黄兴等人晤谈，并由黄兴介绍参加同盟会。从此先父也成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

重要骨干。

先父去日本后，国内黄汉会党人仍在进行各项革命活动。1906年冬，他们联络党人和会党在湘、赣间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^①。初时声势浩大，朝野震惊，清廷急令湘、赣、鄂、苏四省派兵围攻，先父与一些留日党人纷纷回国，准备参加起义的战斗。但此时湘、赣间的起义军在清军重重包围下，弹尽粮绝，已经完全失败。先父极为悲痛，产生一种与虎拼命的想法；他深夜潜入南京城内，企图刺杀两江总督端方，因戒备甚严，未能得手，乃间道走向上海。而端方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皆悬巨赏欲得先父，清吏追捕益急，先父便出走香港，欲会晤黄兴共商对策，适黄兴已去东京，先父在港羁留两月，不及会晤，因此接受留港办报党人冯自由的建议，暂去南洋，徐图再举。

（二）

1907年春，先父开始有南洋之行。他在新加坡、缅甸和爪哇等地作短期考察。其间，曾一度在爪哇三宝瓏中华学校任教。后经过再三考

虑，决定应爪哇邦加岛华侨曾连庆、李天麟之邀前往该岛从事华侨教育工作。当时，爪哇是南洋最富裕的地区，全境有华侨逾百万人，其中邦加岛上有华侨十多人，占全岛人口的 70% 左右，是爪哇地区华侨聚居最集中的地方。该岛盛产锡、胡椒和橡胶，锡的产量更居世界的前列。全岛有槟港、烈港、勿里洋、文岛、楠榜、高木、沙横、昔兰八个重要城镇。槟港为其首府。它远离荷兰殖民中心巴达维亚（今雅加达），水陆交通发达，与祖国往来便利，有利于进行革命活动。以后，先父在槟港居住最久，也是侨居此地最早的湖南人。

先父最初在槟港一所华侨夜校任教员，教导侨生学习华文、华语。由于他爱护侨生，循循善诱；分析问题，极具远见；关心公益，平易近人，很快就受到侨胞的信任和爱戴。长期以来，南洋侨界常为侨胞团结与子弟教育两个问题所困扰。早在 19 世纪以前，爪哇就有华侨组织建立。1900 年 3 月，爪哇第一个华侨社团巴城“中华会馆”即已正式成立，后来其他地区也有过类似的组织。本来这些组织应当解决这两大问题。但是，它们往往受到行业性、宗族性、地域性等方

面的影响，忽视加强全体华侨的团结与推动华侨教育的发展，因此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为此，先父一再向当地侨胞建议，要建立完善中华会馆，团结全体侨胞，并设立学校，教育侨胞子弟。他的建议很快为侨胞所接受。他们立即积极采取行动，推选素孚众望人士筹组会馆，迅速筹措经费，并委托先父负责学校的创建工作。到1907年秋，檳港就出现了邦加岛上的第一所中华会馆和第一所中华学校。

先父在创立檳港中华学校的过程中，既是教员，又是校长，工作十分繁重。由于侨胞子弟大都是当地土生土长，满口说的是马来土语，祖国观念十分薄弱，因此，先父决定以“弘扬祖国文化，培养热爱祖国思想，提高学生文化道德水平”作为办学的宗旨，要求以华语为教学语言，各科教材都用华文编写，主张全校师生在校内一律都讲华语。这些作法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，一些原在荷文学校学习的侨生，也纷纷要求转来学习。随着学校的发展，先父又从国内邀请革命党人陈方度、胡国梁、柳聘农等人前来任教。学校规模由小而大，教育质量日益提高，檳港中华学校很快成为一所南洋遐迩闻名的学校。

此后，在檳港中华学校的影响与先父的大力推动下，邦加岛上各城镇及爪哇其他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办起了中华学校，这些学校陆续委托先父从国内请来一百几十位合格教师，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学校教育水平。正是在这些学校发展的基础上，先父又进而发起在檳港中华会馆内成立南洋华侨教育总会，定期召集各校有关人员开会，交流办学经验，研究解决教学与教育上的问题。到1911年底，爪哇全境已有华侨所办学校近百所。这些学校后来一代又一代把华侨子弟培养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，成为南洋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其中不少华侨子弟回到祖国继续深造和参加工作，也为祖国的革命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！

（三）

爪哇华侨的祖先大多是17世纪开始到南洋来的。当时正值明末清初，海上贸易发达，闽粤商人来者日多。后来王朝更替，社会动荡，东南沿海更有不少华人迁来定居。加以荷兰殖民者1619年占领巴达维亚作为殖民据点后，为了掠

夺爪哇全境资源与开发当地经济，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其服务，曾多次派人到中国沿海各地诱拐中国人前来工作，华侨人数因而大量增加。他们大多是体力劳动者，一般是先在农场、矿山当契约工，以后分散在各地从事手工业、农业和贩运等活动。虽然在 18 世纪下半期，华侨各项经济活动有较大发展，有的华侨甚至发家致富，但是，他们背井离乡，寄人篱下，备受殖民者的剥削、压迫与欺凌，追根问祖，饮水思源，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和祖国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情。先父平日和侨胞们的谈话中，注意使他们认识到：由于满清政府腐败与无能，炎黄子孙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只有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，海内外中国人才有光明的前途。现在中国同盟会正在国内进行反清爱国的革命斗争，希望侨胞们参加到这场斗争去！正是在先父的号召下，檳港很多知名的爱国侨胞，如温庆武、黄甲元、蓝瑞源、曾连庆等人首先带头参加了同盟会。

当时，荷兰殖民者对华侨实行“甲必丹制度”，“甲必丹”为荷语“KAPITAN”一词的音译，意译为“侨长”，即在每一地区任命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华侨为甲必丹，由他们管理华侨内部

事务，成为处理华侨与殖民当局关系的半官方华侨头领。温庆武就是檳港的甲必丹，他为人正派，对祖国有真挚的感情。通过他的宣传与介绍，以后又发展了邦加其他七个城镇的甲必丹和其他爱国侨胞 60 余人参加同盟会。1907 年 11 月，经中国同盟会东京总部批准，同盟会檳港支部在檳港中华会馆成立。以前孙中山曾计划在爪哇成立同盟会组织，因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拒绝而未果^②。现在这个禁区被突破了。其后，同盟会迅速发展，不久，同盟会员遍布邦加全岛。 拗胡国梁撰《辛亥广州起义别记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后来这个邦加岛完全党化了。”其后先父又利用假日周游爪哇全境及新加坡、缅甸等地，经常往来于谏底里、巴达维亚、泗水、三宝垅之间，吸收大量侨胞参加了同盟会。数年之间，在爪哇全境及南洋其他地区陆续扩建一批同盟会支部，并经同盟会东京总部批准，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总部，共辖邦加 10 支部和爪哇全境及新加坡，缅甸等地 24 个支部，侨胞参加同盟会者达数千人，反清革命运动在南洋侨界广泛发动起来了！

同盟会南洋总部成立后，先父主持其事，工作更加繁重。他不但抓紧发展组织，而且重视宣

传工作，特别注意发挥报刊的作用。一方面从国内请来一大批革命党人担任报社主笔、编辑和记者，并帮助爪哇华裔商界人士出版《理报》、《泗水新闻》、《综合新闻》等印尼文报刊。另一方面又指导同盟会各地区支部创造条件，独立出版华文报刊。1907年后，同盟会一些支部即有《华锋报》、《爪哇公报》、《泗滨时报》等华文报刊相继出版。所有这些报刊当时在弘扬祖国文化、提高侨胞认识和推动革命工作诸方面，都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。

先父于1907年春来到南洋这段时间中，中国同盟会在国内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，其购械筹饷经费大半仰赖海外华侨的支持，而南洋一隅，接济动辄巨万。先父为此筹划奔走，不遗余力。孙中山就曾说过：“军费唯有从爪哇等地区筹集。”廖承志也说过：“美国和爪哇华侨对孙中山的支持最大^③”。由此可见，爪哇地区的华侨对祖国的革命是作过巨大贡献的。其中我们外祖父母一家就是令人难忘的典范。

1909年，先父在槟港认识先母林亚华。先父刚正开朗，先母贤慧善良，两情相悦，结成伉

俪。外祖父林那能，原籍广东雷州半岛，清未来邦加，先在矿山当契约工人，期满后以种植当地特产胡椒、橡树为业。外祖母邓鸿兰，也是来自雷州半岛华侨。两人成家后，辛勤劳动，生产大有起色，在连续几年丰收后，兼营锡矿业，终于成为巨富。他们致富后，仍然保持劳动者的本色，以诚待人，助人为乐，热爱祖国，支持革命。大姨父夏群盛与大舅父林振德都是当地名流，也都是同盟会员。每当国内革命需要帮助时，他们每次都能带头捐输巨款，圆满完成任任务。当时邦加岛华侨教育不发达，先母仅仅受到华文小学教育，她在这种热爱祖国的家庭的熏陶和教育影响下，先母从小就养成了爱祖国、爱劳动的思想品质，身在异邦，胸怀祖国。对于先父为革命孜孜奔走，十分同情和支持。在后来与先父共同生活的岁月中，两人互相关心，互相理解，同甘共苦，相濡以沫，永远保持深厚纯真的感情，人们称赞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佳话。

（四）

同盟会是 1905 年 8 月，在孙中山的倡导下，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，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。举孙中山为总理，由黄兴等分任执行、评议、司法等部工作，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，原来各个组织已不复存在。但原光复会的部分成员仍然保持双重身份，继续独立进行革命活动。先父在南洋期间，同盟会东京总部由于成员中对一些问题意见分歧，争论与风波一直不断。尤以原光复会负责人章太炎、陶成章与孙中山的分歧日益激化。1909 年 8 月，陶成章来到槟港，谈到同盟会党务、人事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，对孙中山极为不满，先父颇为同情。陶遂邀约先父及魏兰、沈钧业、陈方度、胡国梁等人联名上书同盟会东京总部，指责孙中山，要求改选黄兴为总理。陶成章带着这封信赴东京总部，要求开会讨论，遭到黄兴、刘揆一、谭人凤等人的坚持拒绝。他们一面向陶规劝解释，一面致函先父等，逐条为孙中山申辩。为此，陶迁怒黄兴等人，并用“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”为题，以“原《民报》社长章太炎名义”，采用传单形式发布，引起了各方面的注视。1910 年 2 月，光复会机关总部终于在东京恢复成立，由章太炎、陶成章